

从老画报中追忆戈公振

周利成

1935年10月22日,年仅45岁的报人戈公振突然病逝,全国数十家报刊纷纷报道。黄炎培、邹韬奋、沈钧儒、张若谷、潘公展、张恨水、郑逸梅、邵洵美、成舍我、黄寄萍、顾执中等数十位社会各界人士,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发表近百篇追思文章,回忆他们与戈先生的过往,高度评价他对中国新闻事业的突出贡献,充分肯定了他的爱国精神和高尚人格。

矢志出版事业

“先生矢志报业,不好高骛远,坚持以报业为修身专业,生平廉洁自持,怡然自得,其意志之坚定,服务之勤敏,进取之雄心,为吾道中人所罕睹;不特争新闻记者神圣之地位,抑亦足为社会各界之表率。”这是《申报》编辑黄寄萍在《纪念戈先生之意义》一文中对戈公振人生的总评。

戈公振(1890—1935),原名绍发,江苏东台县人。因家境贫寒,中学毕业后辍学,1913年进入时报馆学徒,开始了他奋斗一生的新闻事业。因勤谨聪敏、好学不倦,深得社长狄平子器重,旋即担任校对,未几复升编辑,终至副总主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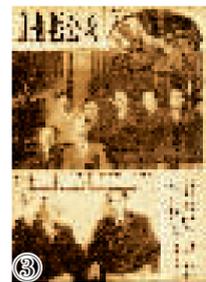
戈公振开中国报业多个领域之先河。当时国内报纸多不注重体育新闻,他以《时报》为阵地,首倡体育赛事报道。1920年6月,他创办的《时报图画周刊》,结束了中国画报的“石印时代”,开启“铜版时代”,让中国画报步入一个摄影时代。1927年第一卷第2期《新闻学刊》中《戈公振》一文写道:“时吾国报纸尚在幼稚时期,昧于新闻原理,且多因陋就简,墨守陈法。《时报》则根衡原理,旁考西文,为种种之革新,作同业风,皆戈氏之肇画也。如‘特约通讯’独开风气之先,名记者黄远生、徐雪汉、李昭实、王万叶诸氏先后荟萃。年来风行一时之文学、小说、电影各种刊物亦创自《时报》。”

1921年,狄平子将时报馆兑给上海

富商黄伯惠,戈公振因受到排挤而于1926年辞职。从1925年开始,他先后在上海国民大学、南方大学、大夏大学、复旦大学等学校讲授新闻学。组织上海报学社,以对抗外国人操纵我国新闻事业。1927年,倾注了戈公振三年心血的《中国报学史》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。该书通过作者积累的大量一手珍贵资料,第一次全面、系统地记述了从汉唐到五四运动前的中国报刊产生、发展的概貌,成为中国新闻史学的开山之作。

1929年,应史量才之邀,戈公振进入申报馆。戈向史建议“本报为中国唯一大报……倘有图画增刊,不仅增加声价,扩大销数而已,且将为国家光荣有进一步之努力焉”。于是,1930年5月18日,戈主编的第二种画报——《申报图画周刊》问世了。当时中国报刊插图多用铜版,影写版印刷首先试用于《东方杂志》的插图,报纸摄影副刊采用影写版,《申报图画周刊》是中国的第一家。该画报因图片质量清晰上乘,被称为当年画报之冠。

邵洵美在1935年第8卷第10期《时代》画报中发表的《戈公振先生》一文,对戈公振在中国画报史的突出贡献给予高度评价:“谈到现在中国新闻界人格最清高的莫不推崇戈公振先生。他是一种埋头苦干的人才,眼光远,毅力大,生活有规则,有高宏的志愿,但不求鄙俗的虚



图①《申报图画特刊》一版

图②1935年第8卷第10期《时代》画报中的戈公振

图③1935年第32卷第22期《东方画报》图文报道戈公振逝世的消息

图④《图画时报》一版

图⑤1935年第2期《大上海人》出版“追思戈公振先生特辑”(局部)

荣。这些对于他的总括的论评,绝不是过誉。我可以用最简单的一件事来证明。我和戈先生认识在15年前,这时他还坐在望平街时报馆的一间小编辑室里。这正是他勇敢地承认画报在新闻界和文化界的重要性,而独自编辑《图画时报》的时候。他绝不和当时一般人的观念一样,以画报为仅供低级娱乐的消遣品,而对之抱极严重的态度与极伟大的希望。”

1935年11月5日,张若谷主编的《大上海人》出版了“追思戈公振特辑”,20位社会名流撰文表达哀思。《世界知识》编辑毕云程在《社会负戈先生》一文中披露,顾少川(顾维钧)任外交部长时,曾请戈出任外交部情报司长,戈力辞说:“因为我不做官,所以对民众说话,还有一些信用;偶然做了官,则一些信用便没有

了。”《新闻报》编辑陆诒的《效法他忠于新闻事业》一文,分析了戈公振与普通新闻界前辈的两点不同:“一、他并没有以前辈先生自居,而不肯接近一般新闻界的后生小子,还常常诚挚地做启迪后生的工作;二、他对学术上思想上的求进,还是很努力,并没有自满,更没有懈怠。跟他同时代做跑腿执笔的新闻记者,有许多已经成了现在的达官要人,他们被汽车、卫兵、洋房、美人和一切优越富丽的享受,弄得目眩头晕,丧心病狂地忘尽了新闻记者的神圣,毅然将新闻记者这个头衔当作升官发财的阶梯,但我们的戈先生却没有这样做。这并不是他没有这种献身投靠的机会,而是因为他忠诚于新闻事业的服务,愿意为新闻事业的信念,不断求进的精神,在推进中国新闻事业的大道上进步前进!”



(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)

高尚的人格

民国时期文人之间善打笔战,甚至一个人去世后,也难免有人指摘逝者的不足。但翻阅所有追思戈公振的文章,对他的人品众口一词地只有称赞。读着这些充满激情的文字,更使人对戈公振先生肃然起敬。

《晨报》社长潘公展的《零碎的印象》一文,总结了戈公振四点高尚人格:“实在

未曾见过第二人。戈先生平时待他如小弟弟般看待,他却始终把戈先生当作导师。戈先生出身清寒,不曾进过大学,却多年在大学施教;他未曾专业学过外文,却能翻译外国作品、漫游世界多国;他没有中国旧文人的陋习,却有着西方绅士的风度。终年不见他发脾气,老是一副端庄的笑容,使人望而起敬。

最后的送别

1935年3月梅兰芳赴苏联期间,戈公振始终参与策划、接待和宣传工作。故梅兰芳也匆匆而来,匆匆而去。刘海粟、顾执中二人均偕夫人同往,群为注目。夏奇峰与戈公振为30年乡谊交情,一边紧握戈手号啕大哭,一边哭诉自己生平性情暴躁,常得戈君凛然劝阻。此情此景,感人至深。

花圈、花篮堆满堂中,挽联、挽词寥寥可数,或因时促不及撰著之故。朱庆澜书素额曰“天丧斯文”。朱应鹏为“周游海外数万里,小病归来,弹指间天成永诀;尽瘁报业二十年,才长未竟,惊秋雨雨剧悲思”。黄炎培自书一副挽词立轴,语极悲痛,洋洋千言。吊丧鱼贯绕棺一周,借展逝者遗容,以表哀肃之敬,排立堂前,行三鞠躬礼,家族复出至堂前答谢,戈先生乃入殓。

戈公振身后至为萧条,丧事所耗,《申

《申报》编辑马荫良的《忠实诚恳的戈先生》一文,则对戈公振的人品高度概括为四个字——“忠实诚恳”;“戈先生一生服务报界的精神,是忠实诚恳的。我所知道也只是这四个字而已。看到他死后社会人士对于他的悲悼,我便觉得无论什么人,做事待人,处处都要效法他。戈先生生前为人所钦佩,死后能得社会的痛悼,也无非是他一生奉着忠实诚恳做去而已。”

《申报》编辑赵君豪的《历历在我心头的戈公振》一文,先是表达了闻听噩耗时的惊愕:他的两手颤动着,马上打电话向申报馆,得到赵叔雍先生的证实后,才相信戈先生确于两小时前逝世了。他搁起电话,推开笔墨,躺在椅子上心思慢慢地宁静下来,胸中有无限的辛酸,不知不觉地淌下了几点眼泪,后来忍不住,终于哭了出来。他想起了1929年他们到关外的一次旅行,那次在一起约有一个月的光景。他们一行十余人,从上海坐船至青岛、大连,转乘南满列车至沈阳、长春,换乘中车一直抵到哈尔滨。回来时走陆路,在北平、天津、南京等地均短暂停留。在赵君豪眼中,戈先生是学者风度,始终保持着温和、宁静、诚挚、恳切的状态。在海滨里,大家在一处玩纸牌,说笑话。戈先生并不多说话,但每次发表意见总是耐人寻味,给人启迪。清晨,戈先生在很长的甲板上散步,那种消闲淡泊的神情深刻地印在他的脑海里。在哈尔滨,他们二人同住一家旅馆。这家旅馆完全西洋化,戈先生走路、敲门、说话都十分小心。他说:“我们很容易做到礼貌,为什么不回去留心呢?何必给外国人取笑呢?”后来,戈先生不忘旧友,赴欧洲考察时,经常寄来一些书报,在封面上写上几行清丽亲切的小字,语词中充满了暖暖的情谊。

1935年10月22日,戈公振临终前与所有在场的人逐一握手告别,还对护士说:“离国数年,想不到中国有这么好的医院,这么好的医生!”

1935年12月15日午后1时,戈公振的灵柩自中国殡仪馆运达上海市第一公墓安葬,同时举行追悼仪式。前来致奠者几尽国内各大新闻巨头,有马荫良、汪伯奇、严独鹤、潘公展、黄伯惠、黄任之、朱少屏、邹韬奋等,凌其翰刚从比利时归国也赶来致祭。仪式由潘公展主祭,夏奇峰致悼词,汪伯奇、马荫良、严独鹤等先后致词,情真意切,使人动容。“切切实实”四字在评价戈先生时被反复引用十数次。江小鹁为塑赠的铜像,伫立墓前。治丧事务处还拟定了永久纪念办法,将在各大学新闻系设立戈氏奖学金,以造就新闻界人才。

九一八事变后,戈公振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和野心,一方面积极投入到上海文化界的抗日救亡运动,一方面探索中国的出路,提出向苏联学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。《芒种》杂志主编曹聚仁在1935年12月18日《社会日报》中,发表的《戈公振先生盖棺以后》一文介绍称,戈先生在苏联大可以安适一点地过日子。但他觉得祖国太危险了,非回来参加抗敌的阵线不可。这是多么可敬的牺牲精神啊!早在1932年他就曾大发感慨地说道:“东北的民气实在很可用,但是关内如长此无办法,也许会因失望而渐归冷淡……在北平的日军和九一八以前在沈阳一保,横冲直撞……从这样看起来,真是朝不保夕。试问华北坐失以后,南京是否可以偏安?”戈先生的话,在今后的日子里差不多都成为了事实。

《时事新报》主编薛农山在1935年第2期《大上海人》中的《我所认识的戈公振》一文,记述了戈公振为唤醒民众所付出的努力:“1932年2月间正当淞沪血战炮火连天的时候,在海格路一所中学校(好像是现代中学)的楼上,上海的著作者

为了要尽一点中华民族于危亡的责任,曾在那里举行中国著作家协会会议。戈先生是发起人之一。于是,大会中间便开始认识了戈先生。当时戈先生曾经提出了不少积极的主张,尤其是关于著作本身所应努力的途径,有极其深刻的说明。虽然他的意见为嘈杂的空气所掩盖,而没有能够唤起到会人们更大的注意,可是,从现在的远东情势看来,戈先生的意见实在是复兴中华民族的警钟。”

1932年3月,戈公振随国际联盟调查团赴东北考察,不料在沈阳竟一度被日伪军关押。在同年5月4日《福尔摩斯》中《戈公振被捕别报》和5月18日《晶报》中《追述戈公振在沈被拘详况》的两文,较为详细地披露了事件的经过。

调查团抵达大连后,戈公振等人自海圻舰登陆,岂料上岸步行数武,日本密探就跟了过来,自称愿为向导,实则暗中监视。戈公振等人进入一家国人经营的酒肆,点餐果腹,密探极力推荐日本菜,戈公振等人未从,仍食中餐。密探无奈,只得同座就餐,又要来数瓶日本啤酒,劝戈公振等人饮用。戈仍拒绝并故意索饮

烟台啤酒以为抵制。这一举动惹恼了密探,认为戈含有公然侮辱日本之意,街伺机报复,遂向高峰汇报说戈有排日倾向,如若允许其进入沈阳必将对日本不利。调查团抵达沈阳的第三天,团员杨景斌、严恩栖二人,于驻地东方旅馆出发,雇用汽车进城访友,历数小时,未见日军及伪满警探跟随。次日,为了解东北真相,戈公振独自前往商埠地区考察。他进到一间茶肆,方一坐定,即有伪满侦探过来盘诘。戈告以真实姓名和职责,侦探即将其带入警局。在警局,一名华人科长详询其年龄、籍贯、职业等,并称:“你们既是调查团随员,须避嫌疑,以后勿至内地,如不听劝告,即须拘捕。总代表顾维钧尤毋轻进,否则恐有性命之虞,烦请转达。”随后由侦探将戈送出日本车站返回驻地。

通过此次,戈对调查团的软弱无力和国民党政府寄希望于外人的策略甚为失望,遂在《到东北调查后》一文中写道:“到东北调查后,据我个人粗浅的观察,除非举国一致,背城借一,不但东北无收回的希望,而且华北也要陷于极危险的地位。

事实如此,并非我危词耸听……我们自己不争气,只是希望旁人卖力为我们争回东北,本来是不合理情。而国际联盟又是个纸老虎,调查团的五委员只以自身利害为立场,将来报告书的制作,最多只从原则上说几句风凉话。”

1937年第9卷第2期《医事汇刊》中的《戈公振小传》一文,记述了戈公振的最后时刻。他对病榻前的张若谷等好友说:“在俄国有许多朋友劝我不必就回来。但国势垂危至此,我是中国人,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!”他看到自己的祖国面临危难,满腔热忱地跑回来打算参加民族解放斗争的工作,但却壮志以没,抱憾而逝,令人唏嘘不已。为此,沈钧儒先生在1935年第115期《国讯》中刊发诗歌《我是中国人》,表达对戈公振爱国精神的崇高敬意:“浙江古越国,勾践人中杰;尝胆卧则薪,我是浙江籍。苏州有胥门,炯炯照双眸;怒视敌人人,我是苏州生。哀哉韬奋作,壮哉戈先生;死犹断续说,我是中国人!我是中国人,我是中国人;我是中国人,我是中国人!”